

台港文学：

文化生态与写作范式考察

白杨 著

台港文学：

文化生态与写作范式考察

白杨 著

◎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港文学：文化生态与写作范式考察 /白杨著.一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601-4731-4

I. 台… II. 白… III. ①文学研究-台湾省-文集②文学研
究-香港-文集 IV.I209.958-53 I209.96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3113 号

书 名:台港文学:文化生态与写作范式考察

作 者:白 杨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刘子贵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5 字数:500 千字

ISBN 978-7-5601-4731-4

封面设计:创意广告

长春泽成印刷厂 印刷

2009 年 9 月 第 1 版

2009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8499826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第 44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20080440600)**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2008BWX07)

生命空间与诗学解读

——序白杨著《台港文学·文化生态与写作范式考察》

刘中树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台港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逐渐进入大陆学界视野,虽然受信息沟通渠道和传统研究观念限制,研究者对这个领域的深入探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但由对这个领域的关注而引发的在学术理念、研究视野等方面调整与反思,一定意义上对完善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结构和文学史形态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知道,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 80 年代中期以后经历了多次思维方式与研究格局的调整,从“20 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到“新文学整体观”、“潜在写作”,以及通俗文学研究、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等问题的持续探讨,传统的文学史范畴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研究者的期待,我们需要在坚持既往学术观念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研究方法、理论思路,一些赋有学术价值和启发性的课题也由此被呈现出来。

同中国大陆的文学形态相比,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提供了一种处于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验和审美格调。蕴涵其中的一些文学母题、人物形象、写作范式,虽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也能得到丰富的展现,但它们在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存在状态,却为我们在完整的时空意义上考察 20 世纪以来的汉语文学,或者在比较研究的层面上反观大陆文学,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从大文化观念的视角考察,20 世纪以来的汉语文学正如一条吸纳了众多支流的长河,在不断的融汇、更新、转折中奔涌前行,对其历史行程的审视,忽略了那些具有建设意义的支流就是不完整的。通常海外汉学研究者在谈及中国文学问题时,他们关注的领域并不

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还包括着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领域,他们是从汉语文学或华人、华裔文学的视角思考问题,一些超越了特定地域、族群和历史时空的文学母题及现象因此得到丰富的阐释,应该说,这种视野和经验对我们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我曾经主持并参与了吉林大学东北亚问题研究中心的学科建设工作,当时的考虑之一即是在地缘因素基础上,立足于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大视野,思考东北亚区域文化和全球化问题。近 20 年来该中心推出了一大批相关的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有关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咨询材料和意见,而且直接推动了我国珲春、图们江流域的国际开发。我始终认为,文化及文学研究需要有一种开阔的胸襟、活跃的思维和扎实求证的学术意识,要敢于探索新领域,并用心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因此,几年前当我的博士研究生白杨将她的研究方向定为台港文学,并拿着一叠发表了她的研究文章的刊物同我商量时,我热情地鼓励了她,希望她能在扎实的史料把握基础上,做较为深入的研究。白杨是能够勤奋并积极地学习的学生,她不负所望,曾自费到香港去查阅和购买资料,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文化想像与身份探寻——当代香港文学意识的嬗变》的写作,并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去年又以项目合作研究的方式去台湾搜集资料,从这部论文集的发表,我很高兴地看到她在不断的磨练中一点一点成熟起来,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了,论文写作的问题意识逐渐加强。东北地区曾经是较早介入台港文学研究的区域之一,但受地缘及学术传承等因素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在信息交流渠道非常发达便利的今天,许多外在的不利因素的影响正在减弱,希望白杨能够努力在这个领域继续做出更大的成绩,并以此为基点不断丰富自己的研究方向。

收录在这部书稿中的文章,以文化生态与写作范式的考察为重点,选取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台港文学中的一些典型个案,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解读。其中,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语境与主体选择之间的复杂纠

结的分析,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台港两地的发展形态的描述,对世纪之交香港文学面貌的阐释,以及对台港文学史写作中呈现出来的学术观念的梳理与反省等等,都是能凸显问题意识的思考。大陆的台港文学研究经历了近 30 年的发展历程,从初期资料的梳理、研究范畴的拓展到批评理念的调整,已经确立了一定的研究体系和规范,这为年轻一代学人进入这个领域提供了不少便利,当然,作为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研究方向,台港文学研究也面临着学术反思的问题,无论是资料的补充发掘,还是研究理念的调整,都使以往一些被忽略的问题重新焕发出研究的价值,比如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与时代关系的阐释,维护传统与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观念之间的冲突和困惑等问题的探讨,随着两岸三地文化交流的发展和信息沟通的顺畅,都可以进行更赋学理意义的讨论。历史地看,台港地区的汉语文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受政治因素等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发展出有自身特色的文学形态,特别是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引入和实践,在先锋实验的意义上,既传承了大陆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超越,其经验与教训对 1980 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朦胧诗、先锋小说和戏剧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也具有前导作用。台港文学在大陆传统的文学史体系中常常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如果抛开地域观念限制,从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中进行考察,至少在现代主义文学实验这个层面上,它们是并不边缘的。相信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对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的深入研究中会有许多新发现,白杨是尝试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也在她的文章中看到了一些细致谨严的分析,这种问题意识对深入研究至关重要。

在强调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的同时,我一直都很重视对史料的掌握与辨析。史识的确立来源于翔实、准确的资料,而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对史料的运用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2007 年,白杨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跟随陈思和教授做课题研究,她的选题“台湾‘创世纪’诗社研究”,正是一个侧重史料整理与发掘的课题,部分

研究成果在这部书稿中有所呈现了。她曾经跟我谈起,在台湾搜集资料时,对上个世纪 50 至 70 年代的资料非常感兴趣,这个领域还有许多研究空间可以开掘。希望她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做更细致、深入的阐释。

我常向学生们讲我的老师公木先生为吉林大学校歌写的歌词的一句话是:“人比山高,脚比路长”,只要坚持走下去就没有走不到的地方。学术研究很多时候是一种苦差事,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而且很多时候还要克制寻常的功利得失欲念。不过,如果真的能将精神世界与研究范畴融会在一起,内心世界的收获和喜悦又是难以言表的。《荀子·劝学》篇有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白杨是具有这种精神和气质的,因此,我还是用这句话来勉励她在学术研究的路程中继续“锲而不舍”地探索、前行,取得更多的收获吧。

2009 年 8 月于长春

寻找有效的言说方式 ——序白杨著《台港文学：文化生态与写作范式考察》

张福贵

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近年来都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久盛不衰的热点。这种持续的热门话题，为此领域的研究构成了丰厚的学术积累，从而使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的基础更加牢固，学科性也越来越成熟。我们文学院的青年教师白杨博士就在这样一种热潮中，以自己聪颖的心性、刻苦的努力和丰厚的成果，确立了自己的学术方向。《台港文学：文化生态与写作范式考察》是她继博士论文之后的又一部关于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论著，因为同在一个教研室工作，常常会对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她的新作即将出版，热诚地请我为该书写一点儿意见，但我却很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实在不敢做更多的学术评价，就谈一点儿对于她人和文的内心感受吧。

其实，包括我在内，学界对于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的认识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台港文化与文学的涌入在相当程度上冲击了大陆文化领域，许多学院派研究者还是坚持以雅俗对立的传统学术观念，对台港文学采取漠视或忽略的态度，同学术积累深厚，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思想观念不断引领时代思潮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相比，台港文学研究的吸引力并不是很大。这种认识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一种学科的偏见，当然，受当时资料积累和信息交流方面的限制，研究者要在这个领域深入下去也有现实的困难。说到底，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跨文化现象，研究者可能需要有更多的文化积累和知识储

备。白杨对于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热衷并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学术困惑后的无奈选择,而是有着很深学术积累和兴趣的。她曾经和我谈起,读大学时“台湾文学研究”的课是张恒春老师讲的,从那时起她就对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知道张恒春老师当时和延边大学的于寒等几位老师一起编写了《台湾文学史》,这是东北学者的第一部台湾文学研究的著作。那个时候,这个领域还不叫海外华文文学,而叫港台文学,注意,一般不叫台港文学。白杨选了张恒春老师的台湾文学选修课,毕业论文做的也是这方面的题目。所以算起来,她也是这个领域的“老人”了,绝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新秀。

在学界同仁的帮助下,白杨近些年来进步很快,文章写得很灵秀很老道。她文章的一大特点是文笔优美,如行云流水,婉约而机智。我曾经说过,文学创作在于一种感觉,而文学批评和研究也在于一种感觉。白杨的文学感觉很好,细腻、深切,语言富有表现力。她能把逻辑思辨的深刻性和作品赏析的抒情性结合在一起,使人能够体会到所评价的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文章读来很容易打动人。她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通晓畅达。现在学界有一种玄学化倾向,愿意用人人都不懂的语言说人人都懂的道理,其实这并不难;而用人人都懂的语言说人们都不太懂的道理才不容易。但是,白杨做到了。

我与白杨的相识是在 1990 年代中期,那时她还是一个天真腼腆的女孩,从美丽的江城来吉林大学读研究生,导师是郝长海教授。后来毕业留校任教我们成了同事,但是接触也不多。1997 年复旦大学陈鸣树教授夫妇来文学院讲学,我和白杨陪了他们一天,那算是说话比较多的一次。她谈了自己的学术设想,说是想研究台港文学。当时我是没有太在意的。因为从历史文化地理位置来看,东北地区学者研究海外华文文学都不具有优势。所以,白杨刚刚进入这一领域时我是有所疑虑的。但是经过几年来的学术实践,我不仅打消了对她的疑虑,而且从心底里升起了一种敬意。

白杨走到今天很不容易，读博士，做博士后，去韩国教汉语，去台湾搜集资料……翻过了一道道坎，越过了一个个关口。能有今天的成绩，足见她昨天的努力。白杨天性善良，是个热心肠的人。院里和教研室有一些报表论证之类的事都常常找她，而她无论自己再忙也从不推脱。近些年来，量化评估体系日趋严密繁琐，事情越来越多。我曾经说自己当院长以来就干了两件事：评审和被评审。我们从中受益也受累，而这其中就少不了白杨和其他几位年轻教师的辛苦和功劳。

收录在这部书稿中的文章都是白杨近年来发表过的论文，大体上以对一些具体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的评析来透视历史文化语境的状况，阐述文学与时代、传统与现代、个体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体验等问题。虽然不是对台港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文化思潮的完整性层面的讨论，但选取的一些研究个案，从 1950 年代到世纪之交，仍然能够动态而历史地展现台港地区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追踪了作家们复杂的心路历程与文学踪迹，为我们了解台港文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言说视角。台港文学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生发展，其与大陆现当代文学之间既有文化的因缘传承，也有自身独特的思想意识与美学风格。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对港台文学的关注最初更多是集中在通俗文化与文学的探讨，由此引发的对文学史观念、研究范畴和经典作家作品的重评，在方法论意义上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业文化语境中顽强生存的“文艺”写作，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诸多文类，始终都有一批应当给予深入研究的作品或文学现象，以往的相关研究却并不充分。白杨是尝试在这方面做一些细致思考的，她选择了也斯、陶然、白先勇、《创世纪》诗人群等研究个案，或从思维意识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或从历史语境与个体的生命体验、文学表达方式等层面，寻找台港文学同大陆文学之间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我注意到近年来相关的研究论著已经逐渐增多，这个方面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将历史细化和个性化，在大文学史语焉不详之处填充丰富的内涵。这种带有明确问题意识的探讨，

在理论阐释和资料开掘中展示了学术的活力。

我曾经主持完成了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招标项目“教科书写作的突破与文学史哲学的确立”课题的研究，尝试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进行学术本体的确认和方法论的总结，在一般思维逻辑上确立一种文学史哲学观念，从而把文学史学上升为文学史哲学。在历史的延长线上回顾和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逻辑、伦理基础，我们能发现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如学理诉求与政治思维、教科书模式与多元化、个性化学术要求的关系等等。台港文学在以往大陆的文学史书写体系中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如何面对台港文学进入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书写体系的问题，也是近年来学界讨论较多的课题之一，白杨在《“文学史”重构与书写的限制》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梳理，相信随着资料的开掘和学术观念的演进，这些问题都会得到更加充分的探讨。

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东北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传统的学术中心还有不小的差距，相距遥远，地处边缘，但是隔岸观火，与研究对象保持一种距离，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和发现。而且东北亚区域的华文文学研究似乎还没有起步，利用这种地缘优势，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希望白杨能在这一领域有更多的发现，取得更大的成绩。

2009年8月18日旅途中

目 录

- | | |
|---|-----|
| 序一：生命空间与诗学解读 | 刘中树 |
| 序二：寻找有效的言说方式 | 张福贵 |
| 001 / “文学史”重构与书写的限制——大陆文学史视野中的“香港文学” | |
| 013 / 流徙与家国想象：1950 年代香港文学中的国族认同 | |
| 024 / 叙述、想象与身份探寻——1960 年代香港文学中的“自我形象”表达 | |
| 033 / 继承与超越：从《酒徒》的创作意识看香港 1960 年代现代派小说的思想资源 | |
| 047 / “怎样去说今天的故事？”——香港文学意识与也斯小说中的文化立场 | |
| 056 / 欲望焦灼、情爱困惑与现实批判——文化传统与陶然小说的思维意识 | |
| 063 / 生命体验与陶然小说中的时间意识——关键词所揭示的生存困惑 | |
| 076 / 淡出历史的“香港意识”——世纪之交香港文学的主题与叙事策略 | |

088/ 文化传播中的“鲁迅”——香港文化界对鲁迅的开掘、守望
与精神期待

095/ 学术视野中的香港文学研究——从“人大复印资料”、《读书》
刊载的文章看大陆近年学术研究热点的变化

107/ 台湾现代诗风潮中的《创世纪》诗社研究

117/ 政治文化语境中的个体经验表达——20世纪50年代洛夫
诗歌的写作意识

127/ 朦胧诗在台湾现代诗坛的回响——兼论20世纪80年代
海峡两岸的诗歌交流情况

140/ 生命空间与诗的美学之思——“诗魔”洛夫访谈录

153/ “《创世纪》的守护者”——“诗痴”张默访谈录

160/ 流失在历史洪流中的“台北人”——从白先勇的《台北人》
到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

172/ 批评空间的开创——《小说香港》与赵稀方的香港文学研究

179/ 我们一切的尊严在于思想——《苇思散叶》漫谈

183/ 他异性时空中的灵魂守望——透视旅法华文作家作品展

189/ 狹小空间里的“大世界”——亲历的与被讲述的香港印象

194/ 书写“隐藏”在城市中的世界——解读少君的旅行散文

201/ 冷眼旁观说“汉风”

208/ 共创世界华文文学的新世纪——“第十四届世界华文文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评述

217/ 后记

“文学史”重构与书写的限制 ——大陆文学史视野中的“香港文学”

香港文学进入大陆学院派的研究视野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远未成熟，但各种类型的文学史、准文学史（如史稿、概要、概览、教程等等）却涌现了不少^[1]，这与香港本土研究者的情况恰成鲜明的对比。到目前为止，香港本土很少见到以“香港文学史”命名的研究论著，2003年香港政府艺术发展局曾出资征募“香港文学史”写作计划，结局却因无人应征而不了了之。

比较而言，香港本土的学者对文学史写作似乎采取了一种过于谨慎、挑剔的态度，被认为最有资格与能力写史的一些学者，如卢玮銮、黄继持等人都撰文表示“短期内不宜编写香港文学史”。卢玮銮的担忧源于香港文学资料的严重匮乏，她认为：

由于香港文学这门研究仍十分稚嫩，既无充足的第一手资料，甚至连一个较完整的年表或大事记都还没有，就急于编写《香港文学史》，是不负责任的事情。资料不足或采用第二手资料，或加推想出来的文学史，必然十分粗糙，及必有谬误。而且，由于香港文艺发展情况相当复杂而琐碎，短期内不容易作一客观而全面的评估。^[2]

黄继持对怎样为香港文学写史的思考，除了在意史料的整理利用之

外，亦对文学史写作模式及历史观有所思虑。他指出：

五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学多年来屡遭内地漠视或曲解，七八十年代之交却顿然受到关切。但了解需要一段过程去消除双方的成见；开始时不免借用惯常的模式，……内地出版的几部成书的香港文学研究著作，不论题称“概观”、“简论”，或直接标出“史”的名目者，每按时序，划分时期，或描轮廓，或标方向，或就文体分列，或举作家作品，稍加评说，积成一秩。这样的学术成果自然不免生涩。一方面，固然要怪香港没能提供充足准备的资料，因为香港人也正在重寻往记，认识自己。另一方面，也须归因于内地的文学史研究情况。七八十年代之交，对五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观念与文学史著作模式，刚刚进行反思与调整，尚未真能开出新的格局之际，部分文学研究者注目于香港文学时，除了认识香港社会尚带成见并因“政策”拘牵外，用的是五四以来尤其是五十年代以来的文学观，来裁断香港文学现象与评价香港文学作品。用这一种特定的文学史程式来编排作家作品，时多扞格不入。^[3]

如何处理香港文学（包括台湾以及海外华文文学）与传统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的关系，是关系到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一个基础性的、事关学科立足点的问题，也是近年来反省香港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所在。在文化渊源上，香港文学虽然始终被视为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大陆传统的文学史著述观念仍然将香港文学排除在审视的视野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香港文学的关注热情带有明显的泛政治化色彩，借助香港文学“关注”而进行的文学史“重写”，除了包含着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喜悦之外，也有内蕴的意识形态因素。当以政治回归为前提进行文学的“回归”性描述时，文学史的讲述方式就成为一个格外容易

引起争议的问题了。

这种争议突出地集中在“进入”的方式上，矛盾的焦点是“大文学史”如何调整既有观念以整合区域性文学。目前，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进入大陆文学史体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编撰单独的文学史，二是在大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占有一定的篇幅。香港研究者陈国球在其论著《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中，列专章以“中国文学史中的香港文学”为对象，细致地分析了内地“把‘香港’写入‘中国’”的种种方式^[4]。根据他的考察，大陆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收有“香港”部分者，在1990年到2000年之间约有10余种，包括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金汉、冯云青、李新宇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金钦俊、王剑丛、王晋民等著《中华新文学史》，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以及国家教委高教司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大纲》等。如果不将考察的视野限制在“文学史”名目下，以笔者所见，包括了对香港文学描述内容的还有杨义著《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从出版时限上看，包括了“香港文学”的《中国文学史》远比独立编撰的《香港文学史》要多，但“大文学史”的接纳姿态却并不令香港研究者感到乐观。陈国球概括的“介入性”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板块组合”；（二）情节结撰；（三）秩序的冲击；（四）评断失衡。他是从香港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出现位置、文学性定位、研究对象以及评价尺度等方面清理线索、批评缺失的。值得思考的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大陆学界的“重写文学史”实践对既有文学史结构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诸多体现学术个性和超越庸俗政治学观念的文学史著作问世，将文学史写作与文学史写作研究带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期，但这样活跃的学术探索思潮却对整合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感到陌生，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台湾、香港等地